

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身份建构 ——基于文化适应视角的个案研究

杜春燕, 杜永波, 毛 颖

摘 要: 文化身份的研究对于探究旅游劳工移民的本质, 理解旅游移民文化和社会融合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笔者通过对大理古城旅游劳工移民文化适应过程的考察发现: 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身份是在对移居地的文化适应中建构起来的; 与其他移民相比, 旅游劳工移民文化身份的建构具有更强的流动性、自致性和边缘性特征。文章可丰富旅游移民社会文化影响的相关理论和案例, 并为旅游地和谐社会构建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旅游劳工移民; 文化身份; 文化适应; 大理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841 (2010) 02 - 0026 - 04

一、问题的提出

旅游劳工移民是指由于旅游地游客数量上升, 出现新的旅游服务行业或原有的旅游产业部门出现劳工不足而引起的劳工移民, 在国内外旅游界都属新兴的研究领域。本研究采用的是我国学者杨钊的定义: “旅游劳工移民是旅游地以外劳工迁入旅游地定居并在旅游行业从业超过一定期限的移民”。它具有三个特性: 一是异地性, 旅游劳工移民必须来自旅游地以外, 这里的旅游地主要指吸引物集中、设施齐备、规模较大的成熟旅游景区; 二是职业性, 必须以旅游职业为主要生活来源; 三是长期性, 旅游劳工移民必须在旅游地有一定的定居时间 (如果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对“迁移人口”的定义, 可以用离开户口地 6 个月作为时间标准)^[1]。目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旅游劳工移民产生的动力分析和社会影响方面, 而国内关于旅游劳工移民的研究还较少, 最早关注这个领域的杨钊和陆林两位学者已开始构建国内旅游移民研究体系, 具体成果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西方旅游移民研究趋势进行了综述介绍, 把旅游移民概念引入国内; 二是通过九华山的实证研究, 对国内旅游劳工

移民的行为特征、转移动机、从业感知和转移模式进行了分析, 而旅游劳工移民文化适应和文化身份的研究至今未见涉及。

旅游劳工移民文化研究的难点不仅在于物理空间和时间的变动性, 更关键的是文化空间和时间的“混杂”性, 也就是文化身份的特殊性, 容易使人产生“乡关”何处? 我们因何而来?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等社会定位问题。因此, 文化身份的研究对探究旅游劳工移民的本质, 理解旅游移民文化的形成和社会融合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尝试结合大理古城的实地调查结果, 从文化适应角度对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身份作初步探讨。

二、文化适应与文化身份

20 世纪 30 年代文化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首次提出学术用语上的“文化适应”, 即: “文化适应用于理解这样一类现象, 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通过不断的接触, 使双方或两个群体最初的文化类型发生变化。”本文采用我国学者刘有安教授的观点: “文化适应”主要是指一种弱势文化对于强势文化的适应, 它既是一种过程, 即作为一种弱势文化 (一般为外来文化) 承载者的个体或群体为了生存

作者简介: 杜春燕 (1977 -), 女, 云南大理人, 西南林业大学生态旅游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旅游文化研究 (邮编: 650224); 杜永波 (1978 -), 男, 云南大理人, 大理学院政法与经管学院讲师, 法学硕士, 主要从事经济法研究 (邮编: 671000); 毛颖 (1977 -), 女, 云南昆明人,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编辑部助理研究员, 法学硕士, 主要从事民族文化、编辑学研究 (邮编: 650033)。

不得不学习或模仿处于强势群体的文化（一般为本土文化）如谋生方式、生活习惯、风俗礼仪以及语言等；同时也是一种结果，即处于弱势的文化特性逐渐隐藏、减少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势文化的特性^[2]。因而，移民的“文化适应”简单地讲，就是移民进入某地之后经过心理和文化的调适与适应逐步变为当地人，当最初形成的“移民文化”演变为本地文化时，就标志着移民“文化适应”的完成。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适应，实际上就是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的学习和接受，其过程是通过对旅游地物质、精神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适应，完成从外地人一移民—当地居民的文化身份转变。

身份是某人或群体标示自己为其自身的标志或获得某一事物独有的品质，身份确定是基于自我的身份认同和他人的身份认同的统一。文化研究认为社会人至少应该具备两种身份：一种是固定身份，是自我在某一特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下，被赋予认定之身份，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和属性。在一定时空之下，分享共同的历史、宗教仪式、社会及道德规律的人群，在多种族多民族多国度多信仰的人类世界拥有的地位，它是人的“本质性的身份”。另一种是叙述身份，则是通过文化建构、叙事和时间的积累而形成的认同，它必须经常通过主体的叙述再现自我，处于不断流动的建构与调解过程中^[3]。固定身份是民族认同的基础，而叙述身份是个体自由选择的表达方式。人就是在“命定”与“自由”中完成了自我的身份建构。对旅游劳工移民而言，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与他人的身份认同还没有统一，在游客眼中他们是当地人，在本地人眼中他们是外来客，在自我认同中是“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漂泊者，因此他们具有多重身份，研究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身份，就是对旅游劳工移民多重叙述身份的解读。

文化适应是取得某种文化身份的途径，文化身份建构起来的过程也就是文化适应的过程。因此，可以通过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适应来考察其文化身份建构的过程和特点，从而发现旅游劳工移民身份建构的规律和社会学意义。

三、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身份建构——基于大理古城的个案研究

大理古城作为旅游吸引物集中、旅游基础设施齐备的成熟旅游景区，有较大的旅游商业吸引力，已成为云南省旅游劳工移民聚集的主要地区；加之大理古城所具有的白族文化氛围和旅游文化背景能

更好的烘托出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适应状态，因此研究选择大理古城作为案例地。

本研究的调查主要选取大理古城“洋人街”和从古城南门到洱远路的店铺和游客密集地，共发放问卷 1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38 份。问卷采用 SPSS1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在被调查的 138 名旅游劳工移民中，年龄在 20 岁以下的占 28.5%，20~29 岁的占 39.6%，30~39 岁的占 17.8%，40~49 岁的占 9.6%，50 岁以上的占 4.5%。旅游服务业者占 24.6%，民族手工艺从业者占 29.7%，其他旅游商品经营者占 45.7%。调查对象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初中文化占 50.0%，技校、中专、高中文化的占 29.7%，大学以上的占 20.3%。调查问卷通过对旅游劳工移民在迁居地的物质适应，精神适应和社会适应方面的问题来考察其文化身份建构的特点。

（一）流动性

从物理空间看，多数旅游劳工移民在旅游地只是暂住者。在大理古城的调查发现：旅游服务行业的年轻化特点使得从业人员更新幅度较大；并且由于大理古城作为旅游胜地，物价水平较高，外地劳工在这里购房完全定居下来的可能性不大。在旅游劳工移民居住时间的调查中，选择 6 个月到 1 年的对象为 25.4%，1~3 年为 26.0%，3~5 年的为 26.1%，5 年以上的仅为 22.5%。从谋生方式看，旅游劳工移民较其他移民具有更强的逐利性，他们移居大理的原因就是看重它强大的旅游商业机会，经济条件是否改善直接影响移民文化适应的感受和评价，一旦处境不理想或别处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他们就会选择移居。从文化空间看，旅游劳工移民由于经济条件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像消费导向旅游移民那样在文化适应上有较大的自主性和自我性，而是必须被动的适应当地社会文化来谋求生存发展。表 1 显示：旅游劳工移民生活习惯的适应包括饮食习惯、地方风俗、语言、宗教信仰等几方面，其中尤以当地地方风俗和语言方面的适应过程最为吃力。这个结果意味着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适应主要集中在物质和社会层面，而精神层面则触及不多，说明当事人并未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中，文化身份建构处于一种流动状态。

旅游劳工移民具有普通移民的身份特点，同时具有旅游流动人口所具有的消费主义、多元文化、世界主义特征，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移民，旅游劳工移民还具有主体构成多样性、表现形式复杂性、移民感知差异性、行为方式渐变性等复杂特

性^[1]，难以用一种或几种身份明确界定。旅游劳工移民在适应旅游地文化的过程中，自身的变化是一种必然，一些特质的丧失也在情理之中，新的身份就在这种流动中不断建构起来，“流动”成了旅游劳工移民文化身份的显著标志。

表 1 旅游劳工移民生活习惯适应调查

项目	频率	频数	有效频率	累计频率
饮食习惯	24	17.4	17.4	17.4
当地民族风俗	51	37.0	37.0	54.3
语言	51	37.0	37.0	91.3
宗教信仰	12	8.7	8.7	100.0
总数	138	100.0	100.0	

（二）自致性

当下文化身份研究越来越强调主体的选择性，即身份的自致性而非先赋性，认为文化身份不仅是历史境遇的产物，还是社会（个体）能动性和情感认同的产物，这为研究旅游者或移民的行为和心理提供独特的视角。事实上，旅游文化的研究将旅行视为神圣的旅程，是旅游者的“净化”之行，其目的在于压抑或者超越原来的自身，获得新的人生体验，是对惯常生存状态和身份的一种自我否定。可以说，旅游本身就是人类获得自致性身份的一种途径，而旅游劳工移民则需要在同化与坚守并峙的文化适应中生存发展，就更是一种自致行为。

对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适应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在文化适应的类型（何种迁入地文化）没有选择，但劳工移民却在文化适应的方式（如何适应）上体现出很强的主动性。

在回答“移居后，你认为当地文化是否会改变你原来的文化”问题时，选择不会改变和选择两者会融合在一起的人为 38.0%和 38.9%，24.1%的人选择当地文化会逐渐占主导地位。大部分人表示他们更愿意保留自身的文化底蕴，家乡情结是不能忘记的，这种意识使得他们的文化适应正确兼容多于盲目接受。

在“日常生活中你常使用的语言是”问题中，13.0%的人调查对象选择使用当地方言，55.8%的人选择使用家乡话，31.2%的人选择普通话。调查人群表示他们更愿意讲家乡话，那样更亲切；而当地方言是他们最不愿接受的，因为那样会失去与老家的联系，没有归属感。

在倾诉对象的选择中，未婚者多选择老家的亲戚朋友和当地的朋友，已婚者多选择丈夫或孩子和

老家的亲戚朋友，仅有 15.2%的人选择邻居。从表 2 可以看出，旅游劳工移民的心理依恋主要还是集中在原有的社交圈中。

表 2 旅游劳工移民的交往对象调查

项目	频率	频数	有效频率	累计频率
自己家里的亲戚	52	37.7	37.7	37.7
原来就认识的朋友	47	34.1	34.1	71.7
到这个地方后认识的朋友	35	25.4	25.4	97.1
平时不怎么和谁来往	4	2.9	2.9	100.0
总数	138	100.0	100.0	

调查显示：大理古城的旅游劳工移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既没有完全照搬其从移居地携带来的社会经济关系资源和价值观念，也没有完全排斥移居地对他们有利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资源，而是根据自身面对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以及自身具有的生存发展能力，对所有他们能接触到和了解到的资源进行建构，形成独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质。他们“可以不必在两种文化之间做选择”，而是“可以更加自由而成功地穿梭于其间”，体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移民文化适应状态^[4]。旅游劳工移民改变命运的努力，以及文化创造的能力，充分体现出移民文化身份建构中的自致性特点。

（三）边缘性

与其他移民一样，旅游劳工移民游走于不同文化中，丧失某种“归属感”，而且由于其不同于其他移民的“劳工”性质，文化身份的边缘性更加明显。

从人口特征看，旅游劳工移民中年轻人占主体。在被调查的 138 名旅游劳工移民中，年龄在 20 岁以下的占 28.5%，20~29 岁的占 39.6%，30~39 岁的占 17.8%，40~49 岁的占 9.6%，50 岁以上的占 4.5%；其中女性比例大于男性，二者无论在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上都属于弱势群体，加上变动不居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

从社会网络来看，旅游劳工移民在社会适应上所遭受的困扰集中体现在语言表达能力不佳、缺乏工作能力、缺乏人际网络和缺乏经济独立能力问题上。其中缺乏人际网络最为明显。此外，旅游劳工移民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并不紧密。调查发现，移民在遇到困难和问题需要帮助时，有 36.2% 人选择自己想办法解决，19.6% 的人选择找亲戚，26.1% 选

择找原来的老朋友，13.8%的人选择找来到这个地方后认识的朋友，只有4.3%的人选择找政府。很多人表示不去找政府的原因在于担心政府会偏袒当地人，而且会令事态扩大。可见，旅游劳工移民一方面有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需要，一方面又自动与移居地社交圈保持着“安全”距离；他们认同当地人，但并不完全信赖当地人和当地政府，因此，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社会（区）生活中，旅游劳工移民能够寻求的社会支持都非常有限。

从心理状态看，孤独感是旅游劳工移民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回答“社会生活中你会感到孤独吗”问题时，63.0%的人选择有时，13.8%的人选择经常，23.2%的人选择从不。孤独乃是一种主观上的社交孤立状态，伴有个人知觉到自己与他人隔离或缺乏接触而产生的不被接纳的痛苦体验，深重的孤独感将导致个体的自我边缘化。

边缘化犹如一把双刃剑。从社会学角度看，旅游劳工移民由于在文化上处于边缘地位，容易与“他者”形成认知隔膜进而造成文化上的不均等，影响社会的稳定。从文化研究角度看，旅游劳工移民带来的交错混杂、游离不定的文化因子能够为原有文化提供更多创新的可能。因此要重视传统文化研究和移民研究长期忽视的“文化的交汇交融处”会产生的另一种主题，一种“部分认同”的、一种重新定位的、移民文化的深刻的诗性主题，不仅因为“边缘文化视角是观察文化变迁的最佳位置”，而且还因为“最真的眼睛现在也许属于移民的双重视界^[5]”。

四、结 语

通过对大理古城旅游劳工移民文化适应的初步考察可以发现，旅游劳工移民文化适应的内容除了

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之外，主要是围绕着从事旅游职业的需要展开，例如讲普通话，结交当地人方便做生意等，呈现很强的类型化特征。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身份是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建构起来的，由于文化适应是一个历时很长的动态过程，所以文化身份的建构将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甚至可以说，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身份是在自我的“行走”，他者的注视与研究者的文本叙述中不断建构起来的。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旅游移民来说，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身份具有更强的流动性，自致性和边缘性特征。

就本质而言，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永远的张力，是旅游劳工移民与生俱来的宿命，通过对文化身份的探求，将给旅游移民的概念界定和研究体系构建带来新的思路，同时为旅游和移民文化研究注入更丰富的内涵。

参考文献：

- [1] 杨钊，陆林. 九华山旅游劳工移民行为特征分析 [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07，23（2）：171 - 175.
- [2] 刘有安. 民族学视野下的移民“文化适应”研究——以宁夏汉族移民为例 [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5）：152 - 156.
- [3] 李琳，生安锋. 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观 [J]. 国外理论动态，2004（12）：48 - 51.
- [4] 张文宏，雷开春. 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结构模型 [J]. 社会学研究，2009（4）：61 - 87.
- [5] 生安锋.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 [D].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4.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labor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adaptation perspective

DU Chun - yan , DU Yong - bo, MAO Ying

Abstract: The cultural identity research contributes greatly to comprehending the nature of tourism labor migration; to understanding tourism migration cultur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 author provide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process of tourism labor migration in Dali and finds out that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ourism labor migration is constructed during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of resettlement destinati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labor migr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mobility, self-motivated and marginality. This research enriches the theoretic and field studies of the tourism migration culture and provides some theoretic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Key words: tourism labor migration;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adaptation; Dali